

纪念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四十周年

## 希特勒不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吗?

——评 A·J·P 泰勒《二战根源》

张 继 平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四十年。四十年来的世界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在复杂而急速的变化中世界正走向进步,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但是,有些人总想阻止历史洪流的前进,对历史本身早已作了结论的希特勒、德国法西斯,不断提出荒谬的论断,企图扭转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效劳。这种现象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少数历史学家所写著作中,六、七十年代发展到世界其他国家。他们打着对二次世界大战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希特勒、德国法西斯为什么能夺取政权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幌子,不顾事实,牵强附会地把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的历史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谁都知道希特勒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他们却竭尽全力寻找历史根据为希特勒开脱罪责,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强加在反法西斯国家身上。这无疑是违背历史、歪曲历史的恶劣行径。这种著作竟至流行在西方许多地方,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五十年代,德国少数历史学家的著作,影响所及还有一定限度,因为他们的观点受到德国正直史学家的驳斥。尽管在社会上激起过一些浪花,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没有形成惊人的声势,改变人们对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原来的基本看法。

这股反历史主义的浪潮在六十年代初逐渐影响到英美历史学界,使为德国法西斯翻案的趋势与冷战结合。为了适应某些人的需要,泰勒的《二战根源》一书问世。他在这本三百页的著作中集中说明两个问题:一、希特勒是战争罪犯全是神话;二、大不列颠和法兰西在抵抗和绥靖政策间摇摆不定,从而引起了大战爆发。这样新奇的论断经过英美修正派历史学家的发挥和渲染,其中当然包括泰勒教授,进一步提出希特勒不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不能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英法容忍法西斯扩大侵略,背后得到美国的支持;英法美三国不能回避担负引起二战爆发的责任。这种观点很快得到西方当权人物的支持,受到德国右翼势力的欢迎,如德国新纳粹组织“帝国社”、“德国战士报”就极力响应。因为这种观点有利于为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翻案,有利于某些集团使世界局势向右转,有利于混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他们指责纽伦堡作了错误的审判。毫不奇怪,泰勒这本书作为不列颠历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受到英国上流社会聚居的格鲁布街人士的竭诚欢迎,同时也遭到英美法正直历史学家的反对。

泰勒这本书引起的争论逐渐变成一场极其激烈、经久不息的辩论。针对反对者的意见,泰勒在《二战根源》第五版中写了一篇“第二次想法”一文,继续鼓吹他的谬论,把他的观点加以补充和阐明。到七十年代初,英美历史学家出来反对泰勒的代表人物有 T.D. 威廉

(T. Desmond William)、J. 乔尔 (James Joll)、H. R. 特雷弗—罗珀 (H. R. Tve Vor-Roper)、T. W. 麦森 (T. W. Mason)、C. R. 科尔 (C. Robert Cole)、H. K. 科克 (H. K. Kock)、A. 布洛克 (Alan Bullock)。他们当中有人写过文章，有人写过专论，有人发表过谈话，批评泰勒的观点。总的说来，他们从哲学观点、治学态度、史料应用等方面指出泰勒的论断和根据违背了历史实际，不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泰勒的这本书尽管在各方严厉批评下先后依然被翻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芬兰文、丹麦文、瑞典文、挪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分别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出版，成了盛极一时的畅销书。英美一些杂志和评论家竟大肆吹嘘，把《二战根源》说成是“一本历史杰作，有透辟精道，富有同情心的美妙著述……深深打动着读者”（新政治家 The New Statesman），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泰勒先生引导我们思考一些新问题”（共和国杂志，The Commonwealth），有人甚至宣称《二战根源》现在已成了一本经典性著作”。

迄至最近两三年，西方出版界仍在陆续重印《二战根源》，它的影响可以说十三、四年以来尚未真正衰退。除了英美修正派历史学家奉行泰勒的“说教”之外，其他研究世界现代史、二战史、德国史的历史工作者往往也引用泰勒的观点，无形之中修改了人们原来对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正确评价，把年轻历史工作者引入了歧途。在今天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二战的根源、纠正泰勒先生散布的非科学的谬论，看来完全是必要的。

## (一)

必须指出，泰勒先生在《二战根源》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论点，不管他如何辩解，事实上是为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翻案，为他们推脱承担发动二次大战的责任。为德国战争罪责翻案并不是首先从泰勒开始，德国和其他国家某些历史学家在他之前早已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们出于狭隘民族主义，为战败后的德国恢复名誉。例如F. 菲舍尔教授在《国际势力采用的手法》中，利用第三帝国未曾公布的文献写道：“当德国决心干涉奥—塞战争，它们相信自己优势的兵力，不惜在俄国和法兰西发生冲突的危险。德国的领导们实质上必须承担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道义责任”。①菲舍尔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认为“1914年9月9日特曼——赫尔维希提出的备忘录可能确立了德国发动战争的目标，用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适合的。”但菲舍尔和他们学派中激进的成员无法证明威廉第二及其政府在战争爆发前业已制订领土扩张的计划。希特勒只不过继续贝特曼——赫尔维希的政策。另外，瑞士史学家W·霍弗基本与他持同样观点。他在《预先计划的战争》一书中指出，1914年大战爆发，用劳合·乔治的话说，是“许多国家都滑入战争的大锅中去了”，“1939年爆发的战争是用条索牵住或自觉自愿投入的。”言下之意，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不存在谁是战争祸首，谁是被侵略的无辜者。要是追究谁负发动战争的责任，凡是参加战争的国家都负道义上的责任，即所谓集体犯罪论。

泰勒并不是一下就追随德国或瑞士史学家的脚印，很快建立他整套的学说。在泰勒思想发展过程中最早于1945年发表《德国历史的趋势》一文，和W. L. 夏勒一样，公开坚持德国负有引起战争原罪②中两个人用毒药的责任，就是指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挑起战争并将战争强加于被侵略者头上的罪过。这种看法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从道义上承认了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应承担不能推脱的罪责。但是，泰勒先生在1961年发表他这本声名远扬的大著时，追随菲舍尔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毫不掩饰地指出“或者我该提醒本书读者‘我从未得出

将历史当成一种审判。我写书的时候涉及道义问题也提到道德意识，我却没有用道义标准来作历史裁判”<sup>③</sup>。事实上，他对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挑起战争的原因恰恰站在道义角度为希特勒辩护。他竭力强调“凡尔赛和约从一开始就缺乏道义”<sup>④</sup>，德国人认为那样的处置是不“公正”的，英国工党和美国人士认为这项和约既不道德也无必要。希特勒正是从这“不公正不道德”的问题上大作文章，从而助长德国法西斯撕毁这项和平协议。在泰勒看来，希特勒破坏凡尔赛和约规定，仅从道义上说是合理合法的。这种说法遭到驳斥后，他继续辩解说：“我从来不对战争罪责和战争无辜抱有任何偏见”；“在主权国家的世界里，每个国家为自己利益尽最大努力，对它的错误行动最多可以批评却不能说成是犯罪或不道德行为”<sup>⑤</sup>。从这个命题推论，那么希特勒为维护法西斯国家利益发动战争用不着负任何责任了。他又指出：我们仅仅指责希特勒的错误，其实英法等国在战前所做的事比德国更加荒谬。在这儿泰勒打了一个比喻：“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地利反对我们（德国），提出的各种要求比我们所作的事更加荒谬”<sup>⑥</sup>。“我出版这本书并不是为希特勒个人帮忙。”他说，社会上某些批评家对希特勒进行了种种责难，认为希特勒本人应负大战爆发和大战爆发有关道义上的责任，“我不想持上面这种批判态度，讨论希特勒要负战争爆发的责任。我只是信守如实的事实。”泰勒根据他自己信守的事实研究，他认为希特勒当时所以进行战争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德国本身的利益和要求。德国过去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希特勒自认为象亚历山大或拿破仑一样是位不存在道义不道义的征服者；二是企图打败苏联在东欧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倘若希特勒准备一场大规模战争而反对苏联，那么德国法西斯向西方国家发动这场战争则是一个错误<sup>⑦</sup>。泰勒认为的这样两个目的并不能说明希特勒不是挑起战争的祸首，恰恰相反，希特勒为了达到这样两个目的而犯了挑起战争的罪行。

如果希特勒不负发动战争的道义责任，那么英法是否不负一点战争爆发的道义责任？当然不能作如此绝对推论。西方国家倘若早日认清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拒绝希特勒无理要求，表示更大的决心进行抵抗，双方的冲突可能不会导致大战的来临。如果说西方应负这场战争的“责任”，那就是不情愿承认德国法西斯业已发生的侵略事件，不敢带头反对和及时采取行动制止德国侵略行动发生，从而刺激了希特勒的野心。希特勒十分了解西方这种心理，因而交替使用战争和外交两手策略，迷惑英法统治者。尽管如此，英法等国和利用战争威胁、动用战争手段而挑起侵略战争的法西斯仍然有本质的不同，更不能承担发动二次大战任何道义上的责任。

泰勒认为希特勒不是二战罪魁祸首，另一理由是希特勒根本没有准备发动这场世界性战争。即使希特勒认为要采取战争形式进行扩张，而德国进行战争最大的优势只有到1943—1945年方能取得，即1943年前德国并无力量发动世界大战。德国国防军对希特勒这种判断也给予充分肯定，反对在1939年发动欧洲战争。但在事实上，希特勒的行动完全否定上面这种主观片面、根据不够全面而作出的推断。不管泰勒如何为希特勒扩军辩护，认为希特勒下达命令“加速重整军备”的安排是受军事技术顾问施加压力的结果，但希特勒夺取政权后不断加强扩军备战目的即在准备发动这场战争。只要打开1933—1939年德国法西斯的历史书籍和国家档案，可以找到大量事实说明这个问题。虽然有关1939年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的实力有不同说法，例如仅飞机一项，C·奇尔斯顿估计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德国在第一线飞机约3,000架<sup>⑧</sup>，B. H. 克莱恩认为大战爆发德国有1,000架轰炸机，1,500架战斗架<sup>⑨</sup>；另一说法德国有800架轰炸机，1,450架战斗机；H. 希尔曼估计1939年9月德国在第一线有作战飞机2,400架<sup>⑩</sup>；卡尔·哈达赫认为大战爆发德国有3,600架飞机<sup>⑪</sup>。总之，大战爆发时德国拥有3000架飞机的可靠实力。泰勒认为到1939年9月德国经济对大战准备不够充分，远不能适应进行全

面战争的需要，这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我们必须看到，1933年3月至1939年3月德国军费开支的一半就等于英法军费开支的总和。1938年铁的生产1/4等于英法两国总产量<sup>⑩</sup>。德国缺乏的橡胶和石油从1936—1939年取得有意义的增涨，人工合成橡胶差不多从零上升到1939年22,000吨，合成石油和原油增加一倍多<sup>⑪</sup>。这些都是希特勒当政后为准备战争而积极采取的具体措施。1939年9月前，希特勒利用英法姑息、妥协政策竭力恢复实力，积极向外扩张，重新占领来茵区，干涉西班牙战争，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从而加强了发动战争的实力。不管从任何角度说，泰勒决不能将上面一系列军事扩张获得的力量，排斥于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范围之外，与希特勒1939年9月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此外，在希特勒残暴的扩张中，张伯伦和达拉第推行绥靖政策无疑促使德国法西斯狂妄的野心更加狂妄，加快了大战的来临。可是，泰勒先生却不这样看，他认为绥靖主义者面对复杂的欧洲难题，又想制约希特勒扩张的方向，由于绥靖主义者认识到独立而强大的德意志不理解如何顺应欧洲国际事务发展的局势，他们利用绥靖政策来引导德国。泰勒认为这应当说是无误的<sup>⑫</sup>，即使希特勒远离英法当局的愿望，人们能不能假定使用武力干涉而推翻法西斯统治？泰勒又认为，希特勒利用宪法夺取政权，明显地得到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德国人既然让希特勒取得政权，他们也是能够推翻法西斯统治的。他们在种种原因影响下未能走上这条道路并不是奇怪的事。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思想深处却担心打退德国法西斯的扩张，俄国人会步德国后尘而统治欧洲大部分土地。因此，如果想到英国和法国遇到的史无前例的困难，在策略上采取这样的方法是正确的<sup>⑬</sup>。泰勒进一步说，张伯伦和达拉第正如西方许多政治家一样，他们首先考虑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毫不奇怪会受到广大群众的赞赏，那时除了雷纳德新闻外，英国每家报纸都在为慕尼黑协定鼓掌<sup>⑭</sup>。泰勒也情不自禁地说：“多么卓越的英国成功的政策”，“在不列颠生活中它是一次最好最富远见的成功。这样成功说明德、捷两国之间有了正义的平等。这次成功勇敢地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苛求和愚蠢”<sup>⑮</sup>。泰勒在谈到希特勒不负发动战争罪责、西方应该承担大战爆发的责任时，为什么如此高度赞扬英法姑息、纵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这是因为照泰勒的看法，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既满足英法当局的需要，维护了两个国家的利益，并有支持希特勒向东发展的意图；同时也满足了德国法西斯的需要，保证希特勒的利益。它是双方都欢迎的政策，所以绥靖政策并不包含促使大战爆发的任何因素，与大战爆发的责任更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与泰勒等人认为英法美在对外政策上要负二战爆发的责任又是矛盾的。

## (二)

泰勒为希特勒推御责任的又一论据是德国的对外政策。他认为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和魏玛共和国非常相似。它的基本目的是在维护国家利益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根本一致。基于这一认识并结合德国扩张情况，泰勒进一步认为希特勒不过扮演了德国传统政治家寻找德国传统目的的角色。换句话说希特勒只不过是继承了德国法西斯上台前过去政府的外交政策，利用对手的失误完成向外扩张的结果不过是偶然事件<sup>⑯</sup>。所以，希特勒对1939年前和1939年爆发的战争都不能算是祸首，更不能指责他应负战争的罪责。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十分新颖，也容易蒙蔽视听，使不明白历史原委的人认为谴责德国法西斯不是不公平就是带着政治偏见。

按照泰勒的说法，希特勒真是继承了魏玛共和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当然“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于扩大领土，使日耳曼人在德国主权保护下……作为政策的基础”<sup>⑩</sup>，可以说撕毁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限制，是1918年德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和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1930年施莱彻尔政府暗中已着手重整军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未从重整军备向着实战发展<sup>⑪</sup>，企图用战争来扩大领土。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后，从1936年开始发动一系列局部战争决不能说与施莱彻尔和过去历届政府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虽然希特勒在战略上使用的闪击战，吸收了登鲁道夫总体战的思想，闪击战却不是总体战的继续。严格说来，闪击战是德国法西斯为征服欧洲统治世界采取的重要战略，是希特勒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中独自的创造。

尽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希特勒密籍》中提出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设想，贯串了法西斯政权以前过去政府的方针。事实上，1933至1939年英德两国微妙而紧张的关系与过去十五年的情况大相径庭。从许多事实证明德英两国政府从没有走过去的老路。德国没有继承以前靠英国抵制法国的政策，而是利用英国绥靖和绥靖政策的弱点扩大在中欧和东欧的势力，削弱英国在欧洲大陆维持的传统均势，使两国在尖锐矛盾中不得不兵戎相见，希特勒彻底抛弃在《我的奋斗》中将英国作为盟国的计划，也即是说抛弃了德国传统的对英政策。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将美国描写成是“巨大的美洲国家中的巨人，在处女地上蕴藏着丰富的资源”<sup>⑫</sup>。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兴起，使德国最大限度依靠它的经济力量，作为刺激英国和德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联盟。这一政策确实继续了1918年后魏玛共和国的传统，甚至从1939—1941年12月德国与美国始终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未曾产生直接的严重矛盾。珍珠港事件后希特勒幡然改图，彻底抛弃过去德国对美政策，转而攻击、丑化美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没有什么‘太大’前途，”“一半是犹太化，一半是黑人化”<sup>⑬</sup>。从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看来，希特勒对待美国的态度和双方外交关系起了极端变化。随着欧洲、太平洋形势的发展，最后双方竟变成了交战国，这是德国历届政府当局从未考虑也没有想象的事。

在对欧洲国家中，希特勒法西斯只是在外交政策基本上继承了1933年前德国政府反法政策。希特勒一直提醒德国人注意：1871年前三百年间德意志曾经遭受过去法兰西二十九次进攻。1871年后法兰西在德国强大兵力压力下，前后两次几乎被德国灭亡。希特勒把法兰西作为头号敌人除有传统政治经济原因外，他还认为从战略上必须看到法兰西是德意志最危险的敌人，因为法国具有的战略优势，一旦战争爆发，在一个钟头内法国就能利用飞机威胁整个德国大部分土地<sup>⑭</sup>。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对法国采取的政策却不如此简单。希特勒在1939年9月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并未立即进攻西线的法兰西，首先却侵占了波兰。差不多经过六个月时间才从阿登森林地区突入法国疆土。这是因为随着欧洲形势的变化，希特勒不得不改变原订的传统计划。首先肃清德国背面的波兰，保持苏联的中立，取得东线的稳定和安全，才有可能打败和占领法国。因此，在对待法国问题上也不能说希特勒完全继承了德国过去政府的传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在外交上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1920年开始，德国在军事和外交上与苏联合作是冯·泽克特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1922年4月签订的拉巴洛条约<sup>⑮</sup>是两国经济合作的证明。为了发挥两国友好关系，打破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苏联开办不少学校训练德国空军驾驶员和坦克手，许多德国官员到苏联学习、使用凡尔赛条约限制的其他武器。1928年希特勒在《希特勒密籍》中指责有人强调与苏联接近时说：“德国甚至到今天，许多人仍有较好主张，富有爱国心的人真挚地相信德国必须与苏联联盟”<sup>⑯</sup>，他明确指出：“与苏联联盟是个最大的灾难”<sup>⑰</sup>，因为那会使德意志最后布尔什维克化。1933年后，希特勒公开要求向东建立“生存空间”，将侵略矛头直接指向苏联。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

弃义终于动用大批部队侵入苏联，彻底改变二十年代两国建立的关系，这又怎能说希特勒对苏联政策继续了德国以前政府的传统？

此外，泰勒把1936—1939年欧洲发生的历史事件说成是偶然事件。他认为“历史主要事件的发生在事前不可预测也不可能从道义基础进行评价。”他用公路上出现的车祸作比喻，二次大战的爆发不是来自希特勒个人狂妄的野心，而是由于有不好的车子和道路，发生车祸的原因并非开车人的罪过。希特勒未曾打算发动世界战争，战争发生的原因大体是错误（车子）和机会（道路）造成的，要想确立战争罪犯必须证明“人能控制历史”。可是，不管泰勒怎样狡辩，历史事实是否认不了的，三十年代欧洲出现一系列侵略事件说明希特勒决不是被事件拖着走的狂人。按照1933—1939年危机事件本身证明和反应，希特勒才是唯一的危机肇事人。在这些危机中，当然也包括英法政府执行政策的失误（车子）以及出现有利希特勒扩大侵略的机会（道路）。正是利用了这样的车子和道路，希特勒独往独来，终于导致大战爆发，将整个世界先后拖入战火纷飞的深渊。这场战争的发生决不能说是“德国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被人决定的”<sup>②7</sup>，希特勒不是罪魁祸首。1933—1939年在军事外交上掀起震撼欧洲和世界的一系列危机，是在有计划、有蓝图、乘着希特勒的意志进行的，也是德国法西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英法怎样让步，希特勒一再表示不会向外扩张，事态发展仍然一幕接着一幕地出现。这正是三十年代欧洲历史发展的结果，决不象泰勒所说的那样竟是偶然出现的事件。

### （三）

泰勒为希特勒辩护的另一理由是，三十年代一系列军事外交危机，希特勒尽管充当了主要角色，但他对危机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事前没有计划，在事态发展进程中他往往是被动的，主要应负的责任都在他的对手方面。这种说法是难于作为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辩护词，因为希特勒“是位机灵、冷漠、残暴的野心家，他从别人的错误中得到好处，在幻想里扩大德意志权力。”占领来茵区后，他宣布：“我所走的路乃是上帝口授给一位梦游者的保证”<sup>②8</sup>。用确切的话说，希特勒是一位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者，只要有机可乘，便利用对方的弱点一步一步取得成功。他甚至不顾常规、不怕风险、只要出现有利时机就采取出乎意料的行动，而他行动的最大特点是把机会主义和目标的坚定性结合在一起。他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寻找扩张，从西方国家害怕战争和失误中取得最大的好处。正如A.布罗克所说：表面上看“希特勒经常是临时做决定，直到最后可能的时候才公开他选择的行动，等到获得可以选择的几种可能以后从不作肯定。这种作法并不改变这个事实，他的行动还是遵循逻辑……而与墨索里尼迥然不同”<sup>②9</sup>。所以，无论从《我的奋斗》或《希特勒秘籍》内容来看，希特勒早在1924和1928年对争取“生存空间”、向外扩张侵略就订下了计划和蓝图即建立一个日耳曼帝国。随着欧洲和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蓝图中某些具体细节为适应新的形势有所变化，总的蓝图既未放弃也未更改，这就是他的机会主义与目标坚定性紧密结合的体现。“从整个希特勒大半生活动中可以说他有一贯的崭新的长久计划。他不断追求权力，力图使计划具体反映在整个对外政策上”<sup>③0</sup>。泰勒认为在一系列危机中希特勒处于被动地位，他说：“我们肯定不是希特勒的过错。在政治上他从来没有采取过主动”，他“没有作过征服欧洲或者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sup>③1</sup>。针对别人对他的批评，泰勒又辩护说：“这不是我的错误，根据文献记载，奥地利危机是由舒斯尼格而不是希特勒造成的，”“也根据历史文献，开始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是英国政府的过失而不是希特勒的罪过”<sup>③2</sup>。1938年3月后，张伯伦政府给希特勒的印象是：“他们关心出卖波兰人的权

利超过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希特勒发动战争反对其他国家是“逼上梁山”的结果。为了说明他的谬论，泰勒还举了一个例子：1938年11月30日凯特尔递交里宾特洛甫一份德意军事合作协定草案，这份草案是希特勒命令草拟的。其中第三条说：涉及谈判的政治军事基础是德国和意大利反对法兰西和不列颠发动战争。德意谈判继续到1939年4月。据凯特尔记载，“谈判开始经意大利施加压力，问题向着意大利发展。他们坚持最早到1942年准备尚难就绪，不能参加大战。德国被迫同意了他们的要求”<sup>⑳</sup>。从这件事说明希特勒直到1939年4月还未考虑用战争手段直接反对法国和英国，而意大利也没有参加战争的兴趣<sup>㉑</sup>。大战结束，英法美三国要求利用条约迫使德国承认对战争中每件发生的事负责<sup>㉒</sup>。泰勒引用上面一连串事实并没有说明他想阐述的问题。奥地利危机是不是舒斯尼格造成的？据今天业已掌握的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事情恰好与泰勒的说法相反。甚至就是用泰勒先生自己在本书中的说明材料：希特勒所以占领奥地利，“肯定因为他是奥地利人，他要寻找不能完全消失的奥地利感情”。即使从“感情问题”分析，造成奥地利危机的主导力量显然仍是希特勒而不是舒斯尼格。

泰勒认为1938年苏台德区危机是由苏台德区纳粹党人煽动的，他们逐步造成紧张形势并没有从希特勒方面得到“什么指示”，他们是危机的真正制造者。尽管从形式上苏台德纳粹党人没有得到希特勒具体指示，他们煽动危机的行动却合乎希特勒一贯利用日耳曼民族主义作为扩张领土的借口。他们的行动符合德国法西斯的利益和希特勒的愿望，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的传统和国家的统一。他们的行动实际代表德国法西斯的利益，他们采取的行动等于就是希特勒自己的行动。从慕尼黑协定中，希特勒得到了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将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在中欧建立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基地、与奥地利一起为德国法西斯夺取生存空间奠定了一个踏脚石，这是十五年前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时希望达到的目标。德军占领苏台德区后，希特勒口头上答应张伯伦不再提出新的要求，没有全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意图。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德国竟用武力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任何人可以看出，这是德国法西斯不守信义、撕毁诺言的冒险行径，决不是泰勒以为的“只因希特勒怀疑慕尼黑协定是否有效……他却并没有险恶意图”<sup>㉓</sup>。令人惊讶的是，泰勒先生竟把这一侵略行为和希特勒说成“没有什么不祥的事（希特勒）超过了中间人的身份”<sup>㉔</sup>，把所有责任推向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政府。根据今天公布的各国档案和文献，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泰勒先生歪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

在波兰问题上，泰勒也极力为希特勒辩护，他认为1939年波兰危机是因贝克的强硬态度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动用武装力量的结果。“希特勒原来的计划并没有毁掉波兰的打算，恰好相反，他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德国和波兰的关系便在友好条约下继续发展”<sup>㉕</sup>，到了最后阶段，才使用闪击战摧毁波兰的抵抗。在泰勒看来，从波兰危机到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整个责任就落在贝克、张伯伦等人身上。其实，希特勒要想吞并波兰早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法西斯领导层就作了决定。1939年3月中旬开始不断施加压力，由于贝克的坚持迫使希特勒不敢轻易发动侵略战争，也由于波兰政府展开了应有抵抗，希特勒梦想侵略波兰的计划在方法上不能不有所更改，希望象对捷克一样通过外交谈判签订一项“波兰慕尼黑”协定。即使希特勒加强军事压力“仅不过是加强外交阵线上的神经战”<sup>㉖</sup>。8月26日以后，希特勒延长了进攻波兰的时间，目的在于“不战而胜”而吞并波兰。整个矛盾的主导面仍在发动侵略的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方面而不在波兰和贝克身上。英法绥靖政策的错误是在长时间内影响了波兰问题，早从1938年8月以来，张伯伦和达拉第一直企图将波兰问题按地方性问题解决。他们在德国法西斯咄咄逼人的形势下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甚至1939年9月1日世界战争

全面爆发后，张伯伦仍继续打算牺牲波兰缓和希特勒的矛盾，宣战时间竟至拖了三天，由此正好说明挑起二战全面爆发的责任不在英法而在法西斯的武装入侵。尽管西方不愿与德国用战争解决争端，承认“但泽问题不是(双方)争论的主因”，在希特勒整个侵略计划中最后依靠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所以希特勒说：“我会提供一个宣传的理由开始这场战争。不管在表面上讲得通或讲不通，胜利者从来不问他到底讲了真话或假话”<sup>⑩</sup>。希特勒借口边界事件，发动突然袭击侵入波兰，这是德国军事当局预谋发动战争的主要结果，责任当然在德国法西斯。泰勒又说：希特勒占领布拉格错误地增强他扩大军事行动的野心，不幸的是英国政府对波兰作了轻率的保证，从而增加希特勒对欧洲发动战争的压力。英国政府对波兰从口头保证到议会通过英波互助协定前后经过四、五个月时间，他们对波兰的保证事先未经法国协商，只不过是应付局面而作的一种姿态，并未产生实际的效果。如果说张伯伦要对二战爆发负“责任”，那就是他没有如实地及早地按盟国共同的根本利益援助波兰，对波兰所作的保证长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直到大战爆发后，张伯伦政府没有把一分钱、一枚炸弹、一支机关枪送到波兰人手上。正是没有积极支援波兰从而使希特勒狂妄的侵略野心得逞，但这也不能说张伯伦及其政府要承担大战爆发的责任。

波兰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即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如果按照过去的经验通过平等的外交谈判即可合理解决。但是，德国法西斯从1936年以来不断扩大侵略，威胁欧洲弱小国家的主权。但泽、波兰走廊问题成为波兰独立的象征，英波联盟宣布后同样也关系着英国对外政策的信誉。希特勒从3月21日对但泽和波兰走廊提出归还德国和建设公路、铁路要求。张伯伦和达拉第并不完全支持波兰政府对但泽问题的顽强立场。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支持波兰进行抵抗；另一方面拒绝希特勒利用但泽、波兰走廊问题牵制波兰和英法的关系。希特勒竭力利用这个问题在三国之间制造紧张局势，英国当局依然将这个复杂问题纳入绥靖政策的范围，造成有利于希特勒的侵略。8月20日，但泽、波兰走廊发生危机，德国即在波兰走廊集结军队。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局势，8月31日，希特勒借口向波兰提出的建议遭到拒绝，下达向波兰进军的命令，英法表示德国如果从波兰撤军依然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希特勒自始至终处于居高临下，操纵战争的主动权。所以，9月1日爆发的战争既不是历史上出现的偶然事件，也不是贝克、张伯伦、达拉第有限力量所能左右。至于泰勒主张的“休战”那只有在英法和波兰满足希特勒的“合理要求”，通过外交谈判让德国合并但泽、波兰走廊以及占领整个波兰领土，战争可能幸免或者推迟。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希特勒是否悬崖勒马接受这种让步，迄今仍是一种猜测。

#### 注释：

① A.S.米尔沃德(A.S. Milward)：《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军队》(Germany's Ar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伦敦1968年版，第88页。

② 基督教圣经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的罪，以后由所有的人继承下来，这种罪就叫原罪。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 A.J.P.泰勒(A.J.P. Taylor)：《二战根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美国1961年版，第277、277、278—279、278—279、279、

291—2、291—2、86、276、278、附录Ⅱ、283、284、85、85、95、97、287、289页。

⑧ C.奇尔斯顿(C. Chils ton)：《1938年国际综览》(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8)，伦敦1938年版，第529页。

⑨⑩ B.H.克莱恩(B.H. Kleine)：《德国战经济的准备》(Germany's Economic preparations for war)哈佛1959年版，第264、45—7页。

⑪ H.希尔曼(H. Hillman)：《大国实力的比较》(The Comparative strength of the Great powers)，见《国际综览，1939年3月的世界》

(下转10页)

上式两边从  $t_0$  到  $t_f$  积分得

$$\begin{aligned} & \left( \frac{1}{2} X^T P X + g^T X + \varphi \right) \Big|_{t_0}^{t_f} = \frac{1}{2} \int_{t_0}^{t_f} \{ (u + R^{-1} \bar{B}^T (P + Xg))^T R |u \\ & + R^{-1} \bar{B} (P \bar{X} + g) \} \\ & - (X - d)^T Q (X - d) \} dt \\ & - \frac{1}{2} \int_{t_0}^{t_f} [u^T R u + g^T \bar{B} R \bar{B}^T g \\ & - d^T Q d] dt + \int_{t_0}^{t_f} [g^T \bar{D} d + \dot{\varphi}] dt \end{aligned}$$

将(30)和(31)的端点条件  $P(t_f) = 0, g(t_f) = 0$  代入上式移项, 整理化为

$$\begin{aligned} & \frac{1}{2} \int_{t_0}^{t_f} [ \| X - d \|_Q^2 + \| u \|_R^2 ] dt = \frac{1}{2} X^T(t_0) \\ & P(t_0) X(t_0) + g^T(t_0) X(t_0) \\ & + \varphi(t_0) + \frac{1}{2} \int_{t_0}^{t_f} [ \| u + R^{-1} \bar{B}^T (P X + g) \\ & \|_R^2 - g^T \bar{B} R \bar{B}^T g + d^T Q d \\ & + 2(g^T \bar{D} d + \dot{\varphi}) ] dt \end{aligned}$$

在上式中, 当

$$\begin{aligned} u(t) &= -R^{-1}(t) \bar{B}^T(t) [P(t) X(t) + g(t)] \\ &= -K(t) X(t) - R^{-1}(t) \bar{B}^T(t) g(t) \end{aligned}$$

并使

$$\dot{\varphi}(t) = \frac{1}{2} [g^T \bar{B} R \bar{B}^T g - d^T Q d] - g^T \bar{D} d$$

$$\varphi(t) = 0$$

则最优损耗为

$$\begin{aligned} \min J &= \min \frac{1}{2} \int_{t_0}^{t_f} [ \| X - d \|_Q^2 + \| u \|_R^2 ] dt \\ &= \frac{1}{2} X^T(t_0) P(t_0) X(t_0) \\ &+ g^T(t_0) X(t_0) + \varphi(t_0) \end{aligned}$$

定理证毕

### 参考文献

- (1) 陈锡康等 经济的数学方法与模型: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 (2) 匡永祝 随机经济系统的最优预测 武汉大学学报(自然版)1: (1984)
- (3) M. S. Mahmoud, M. F. Hassan and M. I. Yaunis Dynamic modelling and control in water resources Systems Int. J. Systems sci. 1982. 13. 4. 453—467
- (4) A. sage, C. White Optimal Systems Control(1977)

### (上接59页)

(Survey of Cü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1939) 伦敦1958年版第395页。

① 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0页。

② A.J. 杨格森(A.J. young son):《1920—57年英国经济》,伦敦1960年版,第145页。

①②③④ 希特勒: (Adolf Hitter)《希特勒秘籍》(Hitter's secret Book),即《第二本书》,在美国出版改名为《希特勒秘籍》纽约1983年版,第46、127、128、135页。

⑤ G. A. 克雷格 (Gorden A. Craig):《1866—1945年德国》(Germany1866—1945),牛津1978年版,第392页。

⑥ 希特勒(Adolf Hitler):《我们奋斗》(My struggle)纽约1946年版,第638页。

⑦ F. 斯特劳斯和杨 (Forror straus ard young):《希特勒秘密谈话》(Hitter secret consersdttion)伦敦1942年版,第155页。

⑧ 《国际条约集(1917—23)》,北京1961年版,

第789页。

⑨ P. A. 雷诺德 (P. A. Reynold):《历史 XLVI》十月号,1961年版,第217页。

⑩ M. 多梅鲁斯(max Domerus):《希特勒的谈话和声明 (Hitler's Reder and proklamation)》,维尔首堡1960年版,第606页。

⑪⑫ E. M. 罗伯逊 (E. M. Roberston):《历史性解释,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the origi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伦敦1971年版,第193、88页。

⑬ 《1918—1945年德国外交政策文献集》(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第五卷 No.418,华盛顿1951年版。

⑭ A. J. P. 泰勒 (A. J. P. Taylor)《1914—1945年英国史》(English History 19 14—45),牛津1965年版,第537页。

⑮ 《霍斯巴赫备忘录》(the Hossbach proctocal),见《1918—1945年德国外交政策文献集》第一卷,华盛顿1949年版,第29—39页。